

社区规划理论与实践丛书

丛书主编／刘佳燕

社区规划的 社会实践

参与式城市更新及社区再造

刘佳燕 王天夫 等著

SOCIAL PRACTICE OF COMMUNITY PLANNING: PARTICIPATORY URBAN RENEWAL AND COMMUNITY REBUILDING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社区规划理论与实践丛书
丛书主编 刘佳燕

社区规划的社会实践 ——参与式城市更新及社区再造

刘佳燕 王天夫 等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区规划的社会实践——参与式城市更新及社区再造 / 刘佳燕等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3

(社区规划理论与实践丛书)

ISBN 978-7-112-23314-4

I. ①社… II. ①刘… III. ①住宅区规划—研究—中国 IV. ①TU98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9232 号

本书收录了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规划实践的一批代表性前沿案例, 由案例的主要负责人或主持者执笔, 分别从实践背景、组织、进程、特点、未来展望和挑战等方面进行详尽介绍, 并呈现出空间更新与社会治理协同推进的跨学科特色。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紧密结合当前城市微更新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趋势和前沿探索, 可供城市规划、建筑学、景观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相关专业师生和研究人员, 以及关注社区规划理论和实务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相关人士和社会大众参考。

责任编辑: 黄 翊 徐 冉

责任校对: 王宇枢

社区规划理论与实践丛书

丛书主编 刘佳燕

社区规划的社会实践

——参与式城市更新及社区再造

刘佳燕 王天夫 等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雅盈中佳图文设计公司制版

天津翔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½ 字数: 263千字

2019年5月第一版 201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ISBN 978-7-112-23314-4

(3359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作者简介

刘佳燕 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博士。曾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阿姆斯特丹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学者。现任《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责任编辑、编委，中国城市科学学会城市治理专业委员会和城市大数据专业委员会、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大数据分会、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美好社区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城乡社会规划研究、社区规划与住房研究、可持续城市更新、公共空间规划研究等。

王天夫 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导。任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研究兴趣集中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与后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化与社会结构、中国家庭结构转型以及城市重建等。

序 一

本丛书的社区规划概念在中国的学术建设、学科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均具有创新意义。以往的学术专业上分别有城市规划和社区研究，而社区规划是规划与社区的结合，仅此一点就颇具创新涵义。社区既是“物”的存在空间，也是“人”的生活空间，社区的公共物品因人们的使用而具有了功能属性、美学意义和象征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也形塑了人们互动的形式和深度。所以，作为城市规划产品的社区物质空间就因人的存在和互动而产生了价值标准。我们认识到，不能因研究领域的分割而分裂现实生活的完整性，社区规划突破了传统学科研究的界限，创新了对完整社会、完整社会事实认识的探索。

据老一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回忆，汉字里的“社区”一词是20世纪30年代，费先生与同学们一起在翻译来访的美国芝加哥派著名社会学家R·帕克讲课中使用的community一词时提出的。所以，社区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概念。而关于规划、城市规划的概念，过去主要是建筑学的专业术语。由此看来，“社区规划”概念体现了社会学与建筑学这两大学科的结合。在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中，社区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具有共同生活方式、情感和传统的生活共同体。大量的研究表明，居民参与公共活动是培育共同体最为核心的内容，而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从目前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上看，社区物质空间与社区共同体的互动机制还不甚清晰。当前的社区规划实践，是一个建筑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参与的领域，社区规划结合了社会学和建筑学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对深入认识社区运行机制和提升社区品质具有重大意义。在实践层面，社会学通过动员规划学者和居民的共同参与，将作为建筑结果的社区空间规划规范化，赋予其以活力和价值关怀；建筑学通过对功能、布局和审美的绝佳把握，为社会互动设计了最恰当的表达场景，激发了人内心的美和潜能，为社会团结创造了坚实的空间基础。在理论层面，建筑学可以检验其理论的场景适用性，并能丰富对“参与式规划”的相关理论认识；对社会学而言，建筑规划变成了一项社区公共行动，如果将社区规划视为一种技术的引入，这里面涉及了大量的权力、权益行为以及文化行为，因此社区的物质空间研

究为社会学理论构建提供了深厚的空间领域基础。

社区规划也是为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在社区生活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发生重大变迁，产生了很多新的社区类别，人们对社区生活品质、社区生活质量的要求发生很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学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建设规划传统上主要是专业机构参与的一项行政事务，随着善治的理念和公平的理念向多个领域和行业的扩展，识别并满足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社区需求逐渐成为规划制定者和实施者的工作理念。在此种理念指导下，社区规划一方面能更好地解决传统社区规划所积蓄的矛盾，另一方面，“参与式规划”可以直接将居民的美好需求变为能够落地的专业化方案。社区规划是时代的新产物，本丛书对社区规划实践进行及时的总结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学术的、学科的和理论体系的建设，完善和提升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社会需求的应对机制。

社区规划必须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社区规划是定制化的规划，是为适应各种社区美好需求的规划。高档社区完全可以借助多种市场力量实现高水平规划，但本丛书的案例更多地关注那些公共空间匮乏、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社区，包括众多老旧小区，因为这样的社区在今日中国占据很高比例，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是引导这个新学科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社区规划面对最多的问题便是，如何在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下实现社区空间的改造，如何将各方的有效需求纳入规划制定之中，新的空间如何能长期提升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最终的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费孝通先生曾阐释他的学术奋斗理念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社区规划作为一个交叉学科，也应传承这一理念。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2019年3月28日

序 二

一转眼，指导刘佳燕同志完成她的博士论文《城市规划中的社会规划》已十几年过去了，当时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探讨城市规划工作中社会学领域问题的工学博士论文。十分欣喜地看到，这十几年来佳燕同志不忘初心，无论是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追随李强教授从事博士后工作，还是后来留校执教，均锲而不舍地在这一学科方向上持续耕耘，终有硕果。面对厚厚的书稿和丛书的出版计划，甚喜甚慰。

社区规划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和实践序列中的“迟到者”，从较为系统的观念引进到近年来颇具自下而上色彩的逐步兴起的实践总共也不过20年光景。梳理一下，这种“迟到”是有其原因的。

其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源于礼制、礼法。强调等级化的社会秩序与空间秩序一体化，在漫长的实践中虽有民间智慧和基于经验主义的科学认知为补充，也时有顺应自然的筑城亮点和顺应民生需求的局部调整，但比较严谨的自上而下、层级化的社会序列投影于空间序列仍是主流，并无关注社会问题和基层社会管理单元的空间营造传统。

其二，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体系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从国外引进的。欧洲是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策源地。其源起是对底层社会问题的关注；其实践和方法体系是针对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贫民区问题、工人阶级住房问题等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去做的；其早期解决问题的逻辑是有序的空间环境会带来或催生有序的社会环境，实现生活质量的普遍提升，解决发展中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从空间尺度上看，它的实践体系是从社区入手，逐步走向城市，再走向区域，逐步放大的。同时，虽然工科在城市建设中有极大的工具作用，但其价值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演进一直是社会理想和社会科学所主导的。在这个进程中，城市规划工作是空间权益分配中政府、市场和民众三方博弈的渠道和桥梁，也更是基层民众平衡（有时甚至是对抗）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机器强制力和资本代表的市场强大诱惑力的手段。就立场而言，它多少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基因和反资本主义的色彩，代表社会的弱势群体发声、代表基层民众的诉求发声也是常事。所以，关注社会问题、关注社区规划一直是国际上与大建设和顶层设计并行并互为补充的

学科与实践主流。多年前，张庭伟教授“向权力讲述真理”一文就很好地总结了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史的这一特征。

其三，中国引进现代化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体系的时间点和早期实践者的背景构成有影响至今的效应。伴随着洋务运动和第二次大规模西学东渐之风的兴起，现代城市规划进入中国，从当时知识分子的整体倾向看，表现出崇尚实用、注重科技和追求民主的风气。“拿来主义”居多，少有思想或价值体系的深究，实践中最明显的是初建城市公共卫生和公共服务系统，并引入功能主义规划的方法初建城市功能分区发展的路径。张謇在南通的实践集成度较高，被吴良镛院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其实，兴新学、办工厂、建医院、辟公园等自保一方民生的事，从清末民初直到抗战爆发，不少地方割据者都存类似实践。而当时留洋归来的建筑师、工程师是这一系列具体实践的技术主导者。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陆续出台的一批“都市计划”在理念和方法上已与国际接轨，但数量少，实践期很短，其遗产直到1990年代才又被发掘利用（如大上海都市计划）。“市政社会主义”这个词曾被用于概括同时期的西方战后重建时期，中国那时的实践也有此特点。

其四，当代中国规划体系的形成及社区规划的“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国际形势所迫，学苏联，一边倒，城市建设全面服务于中国迫切需要启动的工业化进程，城市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全面对接曾是其基本特征。记得1980年我进清华读书时还有机会读过不少苏联的城市规划教材，虽然苏联与欧洲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差别巨大，但城市规划体系还是有很强的传承性的，理论和实践中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是与工业化并行的主线，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匹配关系一直被重视。但中国当年的经济基础薄弱，生存环境逼仄，发展压力急迫，要支撑这种理想中的匹配是很难做到的。随后的实践也走上了工业化优先、忽视（或某种程度上放弃）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城市规划曾遭重创。在那个整体资源短缺的年代，连自上而下的配给化的生活供给体系都难维系，更没有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和社区规划需求；况且反右运动后社会学在中国处于被消失的状态，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才得以重建，所以社会规划的“迟到”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社区规划在中国从理论到实践的崛起，在佳燕撰写的前言中已讲得很清楚了。这是对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体系的补充，也是意义深刻的变革，就变革的价值还可以再多说几句。

1. 发展要与社会进步同步推进。在国际语义中，发展更强调精英的作用，更强调自上而下的进展推进；而进步更强调美好生活的个人共享和进程中每个人都有贡献。“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表现出了国家意志超乎寻常的传导力

和执行力。但如何让每个人共享发展成果，消除不充分和不均衡的矛盾则是新问题。简单地用发展的路径去解决是有问题的，最典型的后果就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与发展理念中对统治权力和执行权力的过度运用，以及对内在权力和共同权力的忽视有直接的关系。

2. 内在权力培养和共同权力引导是社会基层治理成败的关键。任何变革的进程，都是权力再分配的进程。权力不仅仅是以国家意志为主体，以等级、传导和支配为特征的统治权，也不仅仅是利益驱动下行动和实施为特征的行使权，另外两种权力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会更重要。一是内在权力，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来自于个人自信和资格认同的权力。这种权力意识和构造能力的丧失是基层社会失去发展和进步源动力的根源。如不重视内在权力的培育，任何外部干预和援助、施舍都无法带来可持续的进步。二是共同权力，这是由共识达成而凝聚的集体权力，是在社会环境中对内在权力的磨合和再组织。缺少共同权力认知的社区是一盘散沙，缺少共同权力认知的社区哪怕时有能人出现，也会“人去茶凉”、“人走政亡”。

3. “高手无定式”，尊重实践者的智力独立性很重要。社区规划现在的实践是多视角、多维度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现象。千万别急于“规范化”，更不要去迷信工具包。从规划史上看，工具包解决的是达标或及格的问题，解决不了创新和变革的问题。社区规划中更重要的是随机应变、方法实验、培育自信、敢作敢为。

最后衷心祝贺这套丛书的出版，并欣喜地看到这里的实践者大多是中国城市规划从业者的“中生代”。这个群体是由共同的价值观凝聚而成的，必定可以青春永驻，不仅仅可以在社区规划中创新“中国方案”，你们的实践也会创造出平衡发展与进步这一国际难题的“中国答案”。

尹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9年4月16日

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和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带来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推动更集约土地开发、更高效生产效率、更舒适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带来大规模、高密度、陌生化以及充满了高度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环境。当我们把目光从长久聚焦的宏大壮阔的城镇化叙事转向每个人的真实生活，不难发现，微观尺度的邻里社区日益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一方面，日常生活环境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服务设施短缺，公共活动空间不足，因停车、晒衣、休闲活动等引发的“空间争夺战”甚至成为众多社区邻里矛盾的主要导火索；另一方面，社区内部、邻居之间充斥着不信任、不安全感，曾经孩子们可以楼下嬉戏、往来串门的场景日愈罕见，引发“重金买张床，老死不往来”的感慨。

应对上述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城市更新，来弥补长期以来微观人居环境建设滞后的欠账；另一方面需要再造我们的社区，从冷冰冰的住宅集合体重新回归到有温度的生活共同体。这对于社区工作中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和方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大规模拆迁重建的更新策略日趋难以为继，关注空间布局和千人指标的居住区规划面对越来越多的存量更新暴露出种种不适应，聚焦矛盾调解或制度建议的社会学干预亦效力有限。社区虽然尺度微观但并不简单，和城市一样，是一个高度复合的社会—空间复杂系统，因而需要多学科、全维度的研究视角和干预手段；另一方面，美好社区的生命力离不开可持续发展能力，来自共同家园共同参与营造的社会实践过程，故而强调从“为人的规划”转向“与人的规划”——这正是社区规划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也是本书书名的来由。

自20世纪末期，国内开始出现社区规划的概念引入、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但大部分在分部门、分学科主导的背景下，或从空间规划视角出发关注物质环境改造和设施配建，或从社会学视角聚焦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伴随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转型，以及中央不断强化深化社会治理创新战略，近年来，在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新型的社区规划实践，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很多已不再是简单的规划委托项目，而成为一个个跨学科团队扎根地方的长期实践探索，对比前者可谓之“社区规划2.0版本”。

2018年5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和社科学院联合主办2018首届清华“社区规划与社区治理”高端论坛,聚焦近年来各地在社区规划方面最前沿且富有代表性的一批实践案例进行研讨,会后整理形成此书。其中凸显出几个特点:

其一,多元模式创新。本书中收集的11个案例作为当前蓬勃发展的社区规划实践浪潮之缩影,展现出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模式推进的探索,可谓百花齐放。从推动主体而言,包括政府、规划机构、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从主导领域而言,有规划设计为主融合社会干预,如北京的方家胡同整治、厦门鹭江剧场文化公园的活化,也有以公共空间改造为抓手指向社区能力建设,如成都的老旧院落微更新;从操作模式而言,有政府搭建开放平台引入文创资源激活历史街区,如北京的大栅栏更新计划,有从社区治理出发培育居民作为可持续社区规划的在地力量,如上海嘉定的愿景规划师工作,也有跨学科团队与基层政府协作整合社会治理创新和参与式社区规划,如北京的“新清河实验”,还有以居民共建花园推动社区参与和邻里联结,如上海的社区花园建设。

其二,跨学科团队协作。正如论坛主题“跨界·共营”所示,这些实践案例的一大成功经验来自于多学科的协作,包括城市规划、建筑学、景观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艺术、公共管理等,甚至有案例负责人曾在互联网界工作多年,巧妙地将“资源链接”的互联网思维引入社区,并实现立足本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背后对于团队成员的跨界对话和协作能力有很高要求,并非简单地进行专业分工然后合并成果,而需要随时共同工作的有机团体,用“系统论”,而非机械式“还原论”的思维指导工作,从而回应社区这个复杂的社会—空间系统。“跨界”的另一层含义,是需要跳出长期以来大量规划设计或社会研究久居学科中央“坐而论道”的局限,面对真实而迫切的社区发展需求,规划设计者需要把精英式的专业判断变成与大众良好沟通的语言并形成共识,把漂亮的空间蓝图落地成为有良好体验的真实场所。社会学者则需要从机制研究、问题评估走向前端,探索对于社会关系干预的可能路径。在北京东四南的案例中,城市规划师跨界筹办社会组织 and 社区基金会,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更新中发挥了重要的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作用。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工作,恰恰是让我们的学科研究走下象牙塔,走向生活,实现理想落地,并获得社会认可的保障和基础。

其三,在地实践探索。我国早期城市规划和社会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西方成果,包括社区规划和社区营造,但实践显示,中国有着独特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架构,拿来主义暴露出水土不服的问题,不仅出现在欧美经验,还包括同在亚洲的日本等地。所以,我们需要探索自己的路径,这不能仅靠纸上谈兵,而需要扎根社区数年如一日干出来。本书中案例的执笔者都是近年来奋战在社区规划与社区治理实践

一线的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最难得的是，他们将案例实践中的“干货”毫不吝啬地全然呈现，包括规划进程如何组织，社区自组织和更新工作孰先孰后背后的逻辑思考，收集居民意愿达成共识的工作技巧等。例如，北京的“新清河实验”通过议事委员会制度，厦门通过举办共同缔造工作坊，成都则结合当地特色习俗采用坝坝会的形式，收集居民意见，形成社区关注和共识，很好地反映了社区规划源自生活的核心理念。每个案例最后对于实践中的困难和未来的挑战也提出了深度思考，为进一步探索社区规划的政策保障、可持续机制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参考。

其四，从共识到共同行动。达成共识，是社区规划走向成功的前提。这不仅指社区内部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在社区规划蓬勃发展的今天，更涉及相关政府部门、社区规划研究者和实践者、基层社区和社会大众。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论坛的研讨中，在各个案例的总结与反思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例如社区规划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协同，需要多方主体的全程参与，需要从外部助力最终走向以社区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关注过程而非简单的环境改造或活动组织等。基于共识，才有可能走向共同行动，推动改变。

感谢参与本书案例撰写和分享的各位作者，是关于社区规划的共同志向、对于社区发展的共同理想将大家联结在了一起。我们致力于构建社区规划学术和实践共同体，扎根社区，深耕前行，协同奋进，在社区规划工作中创新“中国方案”，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社区响应。

刘佳燕

2019年3月于清华园

目 录

序一 / 李强

序二 / 尹稚

前言 / 刘佳燕

政府主导

北京大栅栏更新计划——历史街区的跨界复兴与社区建设 / 贾 蓉 //2

上海嘉定区社区治理——社区规划师推动模式与制度建构 / 王本壮 徐晓菁 //20

设计介入

北京东四南历史文化街区的参与式更新——生根发芽 / 赵 幸 //42

北京方家胡同整治提升——以设计影响固有观念，以行动激发改变勇气

/ 刘 巍 曹宇钧 //62

北京大栅栏微杂院 / 微胡同改造——胡同微空间改造与社区关系重构 / 李岱璇 王天夫 //80

学者参与

北京清河参与式社区规划——空间与社会的互构 / 刘佳燕 //98

厦门鹭江剧场文化公园的活化——基于共同缔造工作坊的实践 / 李 郁 黄耀福 //114

厦门沙坡尾社区更新——旧城海洋性聚落社区更新中的参与式规划 / 张若曦 刘佳燕 //131

社会组织支持

上海社区花园——参与式空间微更新 / 刘悦来 尹科变 许俊丽 魏 闽 范浩阳 //152

成都老旧院落微更新——从院落治理到参与式规划 / 邓 梅 刘 飞 //169

成都社区公共空间的参与式营造 / 张海波 刘佳燕 //187

1 大栅栏更新计划的提出与试点 图书馆更新计划大京北

新图书馆计划兴建世界图书馆图书馆——

大栅栏，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主导

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栅栏地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大栅栏更新计划

——历史街区的跨界复兴与社区建设

贾 蓉

在老城的保护与复兴中，推倒重来的成片开发模式因其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成本引发越来越多的反思与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有机更新，作为一种重要的模式，逐渐在更多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复兴中被采纳，保护和复兴的目标也包括社会民生、历史风貌保护、文化复兴与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绿色可持续等多个相互融合的维度。

在探索老城保护与复兴创新模式的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的跨界复兴和社区建设往往被认为是复兴和活化老城更新的两种有效途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老城复兴中最活跃的驱动力量之一，通过设计、艺术和文化的跨界复兴，能够发现、利用和提升老城功能，活化街区。社区建设则是在老城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形成本地复兴的社区内生力量的重要基础。

2009年，北京市政府希望破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复兴新模式，提出4个试点，大栅栏作为其中之一，开始探索有机更新新模式。在之后几年北京的案例实践中，相继出现多个街区借助“北京国际设计周”等大型国际城市活动探索老城历史街区复兴的现象，同时社区建设也日益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机构的关注，形成多种不同模式的社区实践。本文围绕在国内首个实现设计跨界复兴与街区有机更新相融合的案例——大栅栏更新计划展开介绍，探讨在老城保护与发展中如何将城市策展的顶层设计与有机更新相结合，如何通过社区建设的方式将跨界设计与艺术介入的活力转化为历史街区内生的、可持续发展的、自我生长的力量，形成有效的老街区跨界复兴之路。

1 大栅栏更新计划的提出与试点

大栅栏历史文化保护区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南侧，占地 1.26km²，是离北京天安门最近、遗存遗迹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 33 片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图 1）。

和北京其他老城区一样，大栅栏的保护、整治与复兴面临着种种甚至更加复杂的：人口密度高，公共设施不完善，区域风貌不断恶化，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严格的历史风貌保护控制，无法成规模地进行产业引入，难以找到一种合适的路径引导在地居民参与改造，尚未形成有效运作模式支撑区域保护与发展。改善民生、社区共建、风貌保护、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取得平衡，这也使得原住民在区域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区域本已落后的生活、社会与经济环境条件继续恶化（图 2）。

在此背景下，亟须采取一种新的模式对大栅栏进行保护与更新。大栅栏更新计划于 2010 年启动，是在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政策指导和西城区区政府的支持下，由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区域保护与复兴的实施主体，创新实践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基于微循环改造的老城有机更新计划。

1.1 大栅栏更新计划的发展模式

（1）实施路径：城市有机更新软性生长的新模式

新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即改变“成片整体搬迁、重新规划建设”的刚性方式，转变为“区域系统考虑、微循环有机更新”的方式，进行更加灵活、更具弹性的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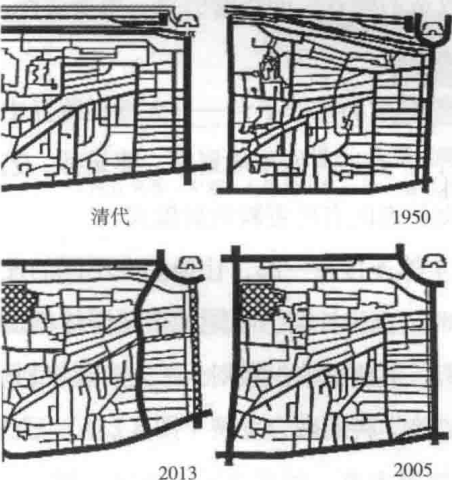


图 1 北京都城变迁与大栅栏区位关系
（图片来源：大栅栏网站，www.dashilar.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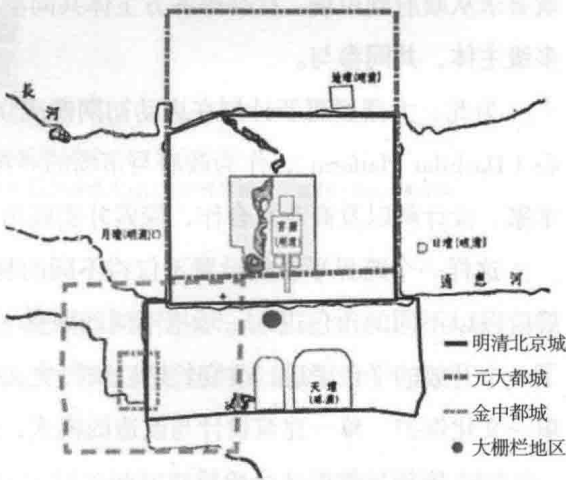


图 2 大栅栏地区不同时期肌理
（图片来源：大栅栏网站，www.dashilar.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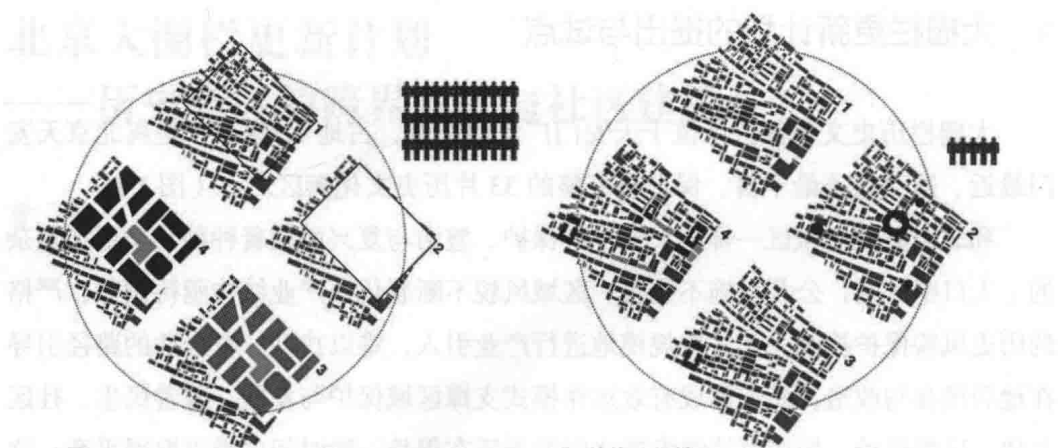


图3 大栅栏节点改造模式

(图片来源:大栅栏网站, www.dashilar.org)

和网络式软性规划,视大栅栏为互相关联的社会、历史、文化与城市空间脉络。对于散布其间的院落、街巷,按照系统规划、社区共建的方式进行有效的节点簇式改造,并产生网络化触发效应,不同节点的改造形成节点簇,逐步再连成片(图3)。这样不仅可以尊重现有胡同机理和风貌,灵活地利用空间,更重要的是,将“单一主体实施全部区域改造”的被动状态,转化为“在地居民商家合作共建、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主动改造前景,将大栅栏建设成为新老居民、传统与新兴业态相互混合、不断更新、和合共生的社区,复兴大栅栏本该呈现的繁荣景象。

(2) 多元主体参与的运作模式:大栅栏跨界中心的搭建

历史文化街区具有重要性、公益性、复杂性、系统性以及不可复制性等特点。这就要求从政府到市场、社会等各方主体共同参与改造的模式,即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级主体,共同参与。

为此,大栅栏更新计划在启动初期便成立一个开放的工作平台——大栅栏跨界中心(Dashilar Platform),作为政府与市场的对接平台,通过与城市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以及商业家合作,探索并实践历史文化街区有机更新的新模式。

这样一个跨界平台的设置不仅将不同的利益主体连接在一起,让他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角色进入,承担不同的职责;同时,也为社会上不同的资源群体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平台渠道,改变长期以来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中单一规划、单一产业策划、单一文化保护、单一建筑设计与改造的模式,形成跨学科的融合发展(图4)。

(3) 实施发展的3个阶段

城市有机更新软性生长的发展模式打破了规划刚性目标的局限,避免了在具体的